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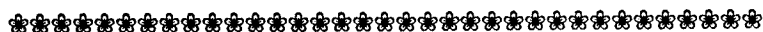
黃約瑟 隋唐史論集

劉健明 編



中華書局

黃約瑟隋唐史論集



劉健明編

中華書局

責任編輯：張忱石

黃約瑟隋唐史論集

劉健明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印刷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7 1/2 印張 · 4 插頁 · 19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500 冊

定價：11.00 元

ISBN 7—101—01634—0/K · 727

序

劉健明

黃約瑟兄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廿二日離開人世，結束了他四十一年短暫生命，但他在推動海峽兩岸唐史學界的聯繫，促進香港與海峽兩岸學界的往來，留下永不磨滅的貢獻。為了紀念約瑟兄在學術上所作的努力，故編選了約瑟兄八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並輯錄了他生前友好的懷念文章，作為對亡友的一種紀念。

約瑟兄主要的研究領域有三方面：隋唐時期的東亞世界，武則天研究及唐代社會風尚。本書也是按此三領域來編選，同性質的論文則選取在內地比較難找到的。約瑟兄極重視研究動態，定期為海峽兩岸學界撰寫研究情報，對研究信息有深入的掌握，《近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最能顯示他這方面的長處。《讀司馬光〈稽古錄〉隋紀割記》則顯示約瑟兄重視找尋史源和對比史料的努力，可以反映他作研究的勤懇態度。

本書的出版得到約瑟兄生前友好的資助，陳坤耀、周佳榮、李金強、蘇基朗、單周堯、楊永安、馮錦榮、曹仕邦、楊靜剛夫婦、麥漢德夫婦、鄒桂昌夫婦和羅永生的慷慨支持，責任編輯張枕石的仔細審閱全書，羅永生協助處理論文的校對，謹代表約瑟兄及其家人，向上述人士致謝。

小 傳

黃約瑟，祖籍廣東省吳川縣梅菉鎮，生於1953年4月25日。他出生於一個基督教的家庭，1964—71年在香港伊利沙伯中學修讀中學及大學預備班，1971年到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進修，1975年取得學士學位，回港後於天虹中學任教一年，便轉到一日本建築公司當翻譯員。1977年遠赴澳洲國立大學，攻讀亞洲研究，他的文學碩士畢業論文是《比較唐代中國與日本奈良、平安時期的官學》。1979年取得碩士學位後，繼續在原校修讀博士學位，1981年到日本神戶大學訪問一年，回港後任職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專職統籌學術研討會的召開，在職期間繼續從事中古時期東亞地區諸國關係的研究，1984年以七世紀的朝鮮戰爭與東亞，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並於同年與潘錦綉女士共諧連理。不幸新婚後不久，發現染上血癌病，經過四個多月的治療，終能克服重病。

黃約瑟天性聰敏，熱愛學習與研究，時常向人表示他最喜歡的就是讀書。他生性健談爽朗，樂觀有自信，為人不拘小節。研究以外，喜觀賞電影、看報刊和雜誌。

1986年以後，他經常出席中國大陸、臺灣及其他地區的研討會、學習班，積極從事隋唐史的研究。在研究重點方面，他比較注意隋唐時期中國與日本、朝鮮的關係，武則天研究及唐代社會風尚。

1993年9月，他因血癌病復發，經過十三個多月與病魔的鬥爭，於1994年11月22日在香港瑪麗醫院病逝，享年41歲，餘下兒子凱威，年僅五歲半。

黃約瑟博士著作目錄

劉健明 羅永生合編

書籍：

黃約瑟、林天蔚合編《古代中日韓關係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7年。

黃約瑟、林天蔚合編《唐宋史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7年。

黃約瑟編《港台學者隋唐史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

高明士主編，黃約瑟撰《中國史研究指南》

第一冊，總論(二)，頁33-46；上古史(二)頁151-165，

第二冊，秦漢史(二)，頁343-352；魏晉南北朝史(二)，頁83-92；隋唐五代史(二)，頁273-276，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

E.K.Y. Chen, Jack F William, Joseph Wong ed., Taiwan: Economy, Society and Histor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黃約瑟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黃約瑟、劉健明合編《隋唐史論集》，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3年。

黃約瑟著《薛仁貴》，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

論文：

"Unfought Korean Wars: Prelude to The Korean Wars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n *Far Eastern History*, No. 22, Australia, 1980, pp. 123-158. (中譯本《沒有兵戎相見的戰爭：公元七世紀朝鮮半島幾次戰爭的前奏》，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11期，頁18-26)

《武士護事蹟另探》，載《食貨月刊》第13卷第9-10，台北，1984年，頁20-40。

《〈舊唐書·地理志〉舊領縣戶口考》，載《東方文化》第25卷，香港，1986年，頁149-177。

《中國大陸“史學危機”何在？》，載《明報月刊》1986年第11期，香港，1986年，頁112-114。

《戰後香港隋唐五代史研究論著簡介》，載《中國唐史學會會刊》第6期，西安，1987年，頁50-76。

《略論古代中韓日關係研究》，載《古代中日韓關係研究》，香港，1987年，頁1-4。

《武則天與朝鮮半島政局》，載《古代中日韓關係研究》，香港，1987年，頁13-26。

《略論李唐起兵與突厥關係》，載《食貨月刊》(復刊)第16卷11-12期，台北，1988年，頁14-25。

《日本起源說》，載《香港留日學友會年刊》第13期，香港，1988年，頁7-11。

《武則天如何登帝位——論立武后詔》，載《武則天與洛陽》，西安，1988年，頁56-70。

《武則天何以會臨朝聽政》，載《歷史月刊》第18期，台北，1988年，頁24-29。

《讀〈曲江集〉所收唐與渤海及新羅敕書》，載《東方文化》第26卷第2期，香港，1988年，頁296-371。

《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閉幕式上的發言》，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1989年，頁46-48。

《讀兩唐書薛仁貴傳》，載《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台

北，1989年，頁935-964。

《武則天與日本關係初探》，載《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1989年，頁249-265。

《試論武則天的臨朝聽政》，載《武則天與文水》，太原，1989年，頁55-74。

《最近十年(1980-89)來唐代學術研究概況——大陸地區》，載《中國唐代學會會刊》創刊號，台北，1990年，頁49-72。

《唐太宗與愛滋病》，載《明報月刊》1990年第7期，香港，1990年，頁99-102。

《試論隋與新羅的“佛教外交”》，載《韓國學報》第10期，台北，1991年，頁299-312。

《試論垂拱四年李唐宗室反武之役》，載《唐代文化研究會論文集》，台北，1991年，頁589-610。

《看風水的唐朝和尚》，載《歷史月刊》第43期，台北，1991年，頁96-109。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隋唐五代史〉讀後》，載《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1991年9月，頁84-96。

《1990年中國大陸唐代研究論著簡介》，載《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2期，台北，1991年，頁51-57。

《近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載《新史學》第3卷3期，台北，1992年，頁149-172。（妹尾達彦日譯《近年について隋唐五代史研究の回顧と反省》，載《史境》第27號，東京，1993年，頁60-88。）

《〈稽古錄〉隋紀割記》，載《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台北，1992年，頁1199-1226。

"The Rise of Empress Wu: A Reappraisal", in *Contacts between Cultures* vol.4, Eastern Asia: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Lewiston, 1992, pp. 104-106.

《日本唐留學生橘逸勢事蹟考》，載《第二屆唐代學術會議論文

集》，台北，1993年，頁901-936。

《房玄齡的後人移民韓國？——從族譜看古代的中韓關係》，載《歷史月刊》第63期，台北，1993年，頁100-107。

《唐朝對外關係教學上的一些問題》，載《隋唐史教學研究會論文集》，台北，1993年，頁69-79。

《大唐商人李延孝與九世紀中日關係》，載《歷史研究》1993年第4期，北京，1993年，頁47-60。

《讀〈前定錄〉劄記——唐代社會思想一瞥》，載《隋唐史論集》，香港，1993年，頁280-294。

《1991及1992中國大陸唐代研究專著簡介》，載《中國唐代學會會刊》第4期，台北，1993年，頁101-123。

《仕高麗朝的後周商人雙翼》，載《韓國學報》第12期，台北，1993年，頁21-43。

《春太郎和神一郎——唐朝到中國的日本商人》，載《歷史月刊》第88期，台北，1995年，頁115-120。

《隋朝對高句麗的認識》，載《韓國學報》第13期，台北，1995年，頁1-18。

《鄭愔政治生涯論述》，載《唐研究》第1卷，北京，1995年，頁277-322。

書評：

"Book review of P.A. Herbert, *Under the Brilliant Emperor*", in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Review*, 3-1, 1979, pp. 110-111.

《試論唐倭之役與七世紀的東亞——評鬼頭清明：〈白村江〉》，載《食貨月刊》(復刊)第12卷3期，台北，1982年，頁110-119。

《評蘇晉仁、蕭鍊子校註〈冊府元龜吐蕃史料校註〉》，載《抖擻》第54期，頁50-52，香港，1983年11月。

《評牛致功〈李淵建唐史略〉》，載《東方文化》第21卷第2期，

香港，1983年，頁180-182。

《讀三本李世民傳記—兼論如何看唐太宗與貞觀之治》，載《讀者良友》第4卷4期，香港，1986年，頁28-35。（又載《歷史研究》1987年第5期，北京，1987年，頁68-77）

《評池田溫〈唐代詔敕目錄〉》，載《大陸雜誌》第77卷第5號，1988年，頁39-42。

《評Bret Hinsch, The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斷袖之情》，載《新史學》第2卷第1期，台北，1991年，頁139-145。

《評小松茂美編〈二玄社版日本書道辭典〉》，載《東方文化》第24卷第2期，香港，1991年，頁306-308。

《評嚴紹璽〈日本中國學史〉第1卷〈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載《新史學》第4卷第1期，台北，1993年，頁141-147。

《評池田溫主編〈唐與日本〉》，載《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1期，北京，1994年，頁164-166。

《評夏林根、董志正主編〈中日關係辭典〉及劉德有、馬興國主編〈中日文化交流事典〉》，載《東方文化》第31卷1期，1994年，頁178-181。

《評洛陽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洛陽——絲綢之路的起點〉》，載《東方文化》第31卷2期，1994年，頁352-354。

目 錄

序	I
小傳	III
著作目錄	V

(一)學術篇

近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3
讀司馬光《稽古錄》隋紀劄記	23
試論垂拱四年李唐宗室反武之役	45
武則天與朝鮮半島政局	61
讀《曲江集》所收唐與渤海及新羅敕書	81
日本留唐學生橘逸勢事蹟考	115
仕高麗朝的後周官人雙翼	139
讀《前定錄》劄記——唐代社會思想一瞥	165

(二)紀念篇

悼念黃約瑟博士(曹仕邦)	187
悼念摯友黃約瑟(楊靜剛)	189
懷念黃約瑟博士(許文超)	193
白雲千載空悠悠(高明士)	197
憶約瑟先生(張忱石)	201
黃約瑟博士與中國唐史學會(牛志平)	205
黃約瑟博士與《香港史天地》(周佳榮)	209
悼黃約瑟兄(劉健明)	215
與約瑟師相處的日子(羅永生)	221

(一)學術篇

近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出現——一個社會學的考察

七、八十年代開始，世界各地相繼成立了不同名目的唐史研究組織。最早的一個應是七十年代後期在日本出現的唐代史研究會，會員以唐代研究者為中心，但也包括秦漢以至宋明及韓國和日本古代史的研究者在內。1981年，中國內地成立唐史學會，主要以唐史研究者為對象。同年北美出現T'ang Studies Society(唐學會)，不久之後台灣亦相繼成立唐代學會前身的唐代學者聯誼會，兩者共通的特色是會員和活動除歷史外又與文學以及敦煌學有關。這幾個會的人數可不少，大陸的會員數目大概已經超過三百，台灣、日本、和北美洲各會的會員數目亦在百人前後。這些現象，是否說明通常把隋和五代也包括在內的唐史研究出現熱潮，引起了大量的興趣和注意，成為了一門重要和發達的學問？

毫無疑問，在世界各地有數百人同時關注唐史研究的局面，實屬空前。但若冷靜一點來看，這並不是一件值得認真大書特書的事。從整個“中國史”學界來看，唐史研究組織的出現並不是唯我獨尊，更非居領導地位。我們可以用宋史的研究組織和活動試作比較：日本的唐史研究會算歷史較長，也是該國宋史研究會的先驅；台灣的唐代學會近年亦甚為活躍，但台灣在六十年代便有宋史座談會；中國內地的唐史學會規模最大，但其成立無非是八十年代初各種歷史學會組織如雨後春筍出現的其中一環；而在北美，從唐代學會年刊比宋史的最早的專業刊物慢了十多年，可見其起步之慢。近年該刊的內容更是文學研究遠多於史學研究，反映了北美唐史研究的不振情況。總而言之，各地唐史學會的成立雖然標示了唐史研究本身的一種前進，卻並不一定反映它們在整個學問領域中的相對重要性。

要理解唐史研究者近年的增加，必須回顧唐史本身的成長與社會的關係。先看我們較熟悉的中國。歷史學在近代中國的成立與專業教育和研究機構的出現密不可分。1949年以前大學不多，資源有限，學系中政治與經濟不分、文學和歷史無別的情形比比皆是。在西方思潮的衝擊下，啟蒙思想使疑古成為中國歷史研究的一股熱潮，分期的問題亦受到相當注意，使國史研究或教學少以傳統的朝代來劃分界限，而多冠以上古、中古等名。以個別朝代為專門論著因此亦不多，唐史方面大概只有鞠清遠、陶希聖的《唐代經濟史》。以斷代為主的隋唐五代史專論，大概就只有呂思勉一本，但這其實是呂氏中國通史著作的一個部份，反映了以唐代作為本身主要關心領域者甚少的情況。這種情形到了戰後漸漸改變，相對的和平帶來了大專教育的恢復和擴展，學生數目的增加則意味了課程的細分化，而在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並未獲得共識下，以舊有的朝代分期便成為自然的趨勢。陳寅恪在戰時寫成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以及後來兩岸出現分隔後岑仲勉的《隋唐史》、傅樂成的《隋唐五代史》等，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這種社會背景下的產品。從這個角度來看，唐史在中國之成為一門學科，其實還未有半個世紀，相對其他朝代而言，可能是發展較遲的一環。

唐史在戰後的中國各地亦有一段時間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而遲滯不前。在中國內地，為了保證新的意識形態能獨佔思想界，歷史研究往往成為欠缺理性和充滿言論限制的活動，不少學術生命因而窒息。幾個較為容許討論空間的領域例如時代分期、資本主義的萌芽等均與唐史少沾上邊，故此唐史大部份的注意便只能集中在唐初和唐末的兩次農民戰爭及土地性質問題上。文革後期，與唐史有關較多的討論大概只有武則天，但這基本上只是政壇上鬥爭的延伸——以武氏歌頌江青、四人幫和代表他們所擁護的法家人物——多於純學術性的辯論，七十年代末期不少的翻案文章，亦因而近乎淪於為人詬病的影射史學。台灣、香港兩地學術風氣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戰前大陸上的傳

統，但這兩地區的研究者畢竟數目不多，加上繁重的行政和教學，均令不少從事唐史研究的學者只能作出有限度的貢獻，在理論方面特覺貧弱。

相對而言，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唐史研究幾乎一枝獨秀，起碼在論著的量上遠超其他地區，這亦與該國社會發展有不可分的關係。日本早在十九世紀末便開始受到西洋史學的影響，比中國較早建立起現代史學。二十世紀上半的日本雖陷於軍國主義，但史學界的活動因此停頓的時間為期不長，避免了如中國因戰亂而學術界出現的人才斷層現象。戰後的長期安定政局和教育發展，亦提供了培養教研人才的可利條件。唐代文化對日本深遠的影響和古代日本大量文獻的保存，使律令研究在該國早在戰前便大行其道，法制史因而成為一門重要學問，唐史方面亦出現了仁井田陞的《唐令拾遺》。日本學界在戰前早對馬列主義有莫大興趣，再加上戰後英法敦煌文書的導入，日本的唐史研究因而主要集中在社會經濟史方面。與此同時，《大正大藏經》的普及與佛教在社會上受尊崇的地位亦使佛學研究例如在出版方面製造了有利條件，令日本至今仍執這方面的牛耳。唐代佛教興旺，有關研究自然亦因而受惠。

如果說，唐史作為一門學科，其產生部份是基於大學教育的需要，則近年唐史研究者的湧現，亦在相當程度上與戰後出生和成長的一代有關。六十年代中後期，這群新生代在世界各地早以學生運動的方式成為一股勢力，但在中國內地由於戰爭結束較晚，加上在學術界有所表現需要訓練，他們的冒起亦相對較遲。中國內地因文革爆發一度中斷的大學教育，後來亦得機回復並重新擴展。為提供新生代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加上如史籍研究所等各種教研機關的成立，一批年青的歷史研究者得以出現。不管在內地或港台，以某一朝代為專門課程的情形並不少見，各種朝代的研究組織特別在內地亦應運而生。

這個人口上的改變令唐史研究上創出新的局面。七十年代後期，中國內地不少學術性雜誌復刊或創刊，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單是唐史方

面每年產生二百篇左右的論文和數十部論著，令人目不暇給，水平雖然參差，仍然是一股巨大力量。長期未能在學術上一展身手的壓抑，改善待遇的強烈追求（論文有稿酬制度，而著作的多寡亦是評定職稱的重要標準）成為推動研究的動力。近年的各種學術活動仍保持一定程度的活躍。台灣、香港兩地大專教育的持續擴展，以及經濟的發展和出版界的蓬勃，亦有利教研的進行。一個共同現象是各地均較多召開各種研討會，並且設法讓不同地區的學者開始互相來往，雖然仍然有不少限制，但起碼打破了過去的局面。不必懷疑，這些彼此切磋討論的機會，或多或少均為研究者帶來一點刺激，增加一些生氣。較例外的是北美情況，美國人在六十年代中對中國擁有的神秘感和現實政治的需要，一度使中國研究稍為蓬勃，但近年的中國形象漸改，在實際需要上日本研究大為吃香，相對之下，古代中國的歷史研究正在走下坡，不如宗教、文學兩方面的研究。

八十年代開始，日本學者首先開始整理了過去的研究情況，1983年出版的《中國史研究入門》（山川出版社）和《アジア史研究入門》（同朋舍）都有專論隋唐部份（五代部份則附於宋），以日本方面的論著為主。前者在1990年由高明士譯成中文，並加入台灣、香港地區戰後至1985年前四十年間研究唐史狀況，成為《中國史研究指南》系列中的第二冊（台灣，聯經出版有限公司）。在此之前，江蘇古籍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人員編的《隋唐五代史論著目錄》，收錄了戰後大陸地區至1982年左右的論著。但八十年代特別是中國內地的研究，已令不少研究領域逐漸改觀。¹¹本文只擬就個人的瞭解，簡單的提出近年研究的一些動向和問題，以供同行參考討論。

二、史料的整理和出版

時至今日，毫無保留接受傅斯年早年提倡“史料學即史學”的人大概不多，中國內地甚至一度強烈反對。但不容否認的是，史料的性